

被规训的叙事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研究

林霆 / 著



014034934

I207.42

113

被规训的叙事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研究

林霆 / 著



I207.42
113



北航

C1714764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被规训的叙事 / 林霆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378 - 4074 - 3

I. ①被… II. ①林… III. ①小说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4138 号

书 名 被规训的叙事

著 者 林 霆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 - 84364428 (北京发行中心)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010 - 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30 毫米 1/16
字 数 318 千字
印 张 19.5
印 数 1 - 3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074 - 3
定 价 58.00 元

序

李新宇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国农民从“互助合作”开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几个阶段，最终的成果是“人民公社”。这个过程被称作“农业合作化”。根据当时的说法，“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合作化”则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光大道”。

公社的成立是 1958 年的事，此后的 20 多年，主要任务是竭尽全力去捍卫和巩固这一成果。之所以需要捍卫和巩固，是因为它的确很不结实，也很不牢靠，随时都有可能垮掉。

然而，“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领导人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把土地经营权还给农民，允许个人发家致富，而且废除了

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合作化运动之前的乡镇建制。

在“十七年”（1949~1966）中，中国文坛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根据当时的说法，更是空前大丰收。当时的小说创作有两个热门题材：一是革命历史；一是农业合作化。这些小说热闹一时，及时地为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献上了颂歌。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到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在努力告诉人们，合作化和公社化是中国农民奔向“幸福天堂”的“金光大道”。

林霆这本书要做的就是要对“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叙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清理，要把它所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承载的思想观念以及创作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全部复杂背景和作家的心态生态，一起呈现给读者。

显而易见，这样的选题难度与意义一样大。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是重大的，不能轻率为之；它所涉及的领域是广泛的，需要多方面的准备。要做好这个选题，不仅需要作者具有扎实的文学专业基础和足够的文学研究，而且需要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支撑；不仅需要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全部涉及农业合作化的作品，而且要深入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这一切都不宜大而化之地宏观论述，而是需要进入具体的微观层面。因为要使文章具有说服力，仅有思辨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的实证材料。

这些困难，林霆都很好地克服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她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首先是全面阅读“十七年”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当下中国学界，博士论文，教授文章，流行的是最省力的做法：你抄他的，我抄你的，不去查阅原始资料。这样做的恶果，不仅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缺少开拓和创新，而且导致了被遮蔽的继续被遮蔽，被改写的依然得不到纠正。林霆不是这样，她从原始资料入手，这从“附录二”所列小说篇目索引即可看到，她是从一份又一份报刊中把作品找来，按时间线索排序，然后进行阅读和研究的。正是这种做法，使她获得了充分的发言权，在对“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叙事做出判断时，不必担心未读过的作品中存在相反的证据。

其次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的深入了解。为此，林霆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要研究作家们对农民合作化运动的叙述，就不能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身有所了解，否则，就无从评判作家们的叙述，也无法认识当时的评论。要了解

那场运动，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文献：一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文件和报告材料；二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出现的相关回忆、反思和研究成果。在这些方面，林霆的准备是全面的，也是深入的。从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文件，到各地的报告，她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在一些点上，还做了深入的研究。比如，邓子恢是因为不能紧跟毛泽东的战略布置而犯了“右倾”错误的，他的情况显然具有某种代表性，林霆找来邓子恢的传记和文集，对其进行深入了解。这样的资料和思想上的准备，自然为她的研究提供了保证。对于合作化运动的研究成果，林霆有广泛的涉猎，比如，光是罗平汉的著作，她就读了《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等。除此之外，如安贞元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秦晖的《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高化民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张乐天的《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农业大波折的教训》等，也都进入了她的视野。林霆对农民合作化运动研究成果的关注，不只停留在那些宏观的叙述，而是对一些个案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比如，她既注意到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的《山西农业合作化》、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写委员会编的《陕西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选编》那样的地方性文献，也充分注意到钟霞的《集体化与东邵瞳村经济社会变迁》、吴文勉，武力著《马鞍村的百年沧桑》那样以一个村子为个案进行研究的成果。总之，为研究“十七年”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叙事，林霆几乎成了一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的专家。这一切，为她的研究带来很大帮助。

其三，为了做好论文，林霆还多次下乡，做了一系列调查和采访。本书的“附录三”就是她采访的部分记录。林霆生长在城市，对农村和农民生活没有切身感受，对于农业合作化的认识，更是来自书面知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也为了聆听亲历者对那场运动的感受和认识，她几次去山东、河北等地乡间，寻找那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听取他们对那段历史的回忆。为了采访全面，她既采访当年农业合作化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也采访当年的落后分子；既采访当时的贫下中农，也采访当时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后人，这种采访使她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无法获得的知识，也加深了对作品文本的理解和认识。

正因为这样，林霆的研究呈现出非同一般之处，它是文学研究，又是史学研究，史学与文学结合，打开了新的思路，带来了研究的新面貌。

要研究的是文学文本，而文学文本写的是某个历史事件，于是就去了解那个事件，结果是：对那个事件了解越深，考察作品时的感想也会越多。林霆遇到的问题：生活明明是那样，作家们为什么写成这样？事实明明是饥寒交迫，作家们为什么说丰衣足食？明明是一条泥泞坎坷的死胡同，作家为什么说它是金光大道？那么多农民和干部都在抵制，作家们为何视而不见？不得不正视之时，为什么一定要解释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解释为敌人的捣乱与破坏？……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不过，林霆并不满足于揭示这一层面的问题，甚至主要精力并不用于这一层面，而是进入另一层面：作家们为什么会这样？是的，文学可以虚构，可以对生活进行再处理，但一个时代的作家如果做了同样的处理，向着同一个方向虚构，这就显示了创作环境和创作主体方面的诸多问题，透露出文学和作家的多重悲剧。正是沿着这个切入点挺进，林霆有许多独到的发现。

知道序言写得太长往往令人生厌，所以想写一篇短序，而且打定主意决不重复正文。写到这里回头看，书中内容未重复，就连精彩之处也未介绍，却已经写了这么多，所以赶紧打住，请读者去读正文。

2013年11月 天津社会山寓所

目 录

导 言	001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001
二、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005
三、本文的研究目标、方法和思路	013
第一章 基本叙事模式的形成与完善	015
第一节 多元形态共存的初建阶段	016
一、前“一体化”的小说创作	016
二、《三里湾》意义建构的起点	024
三、体制化的文学环境	031
第二节 趋向整一的过渡阶段	036
一、《山乡巨变》向意识形态化的趋近	036
二、文学批评之于小说意义的建构	044
三、刘绍棠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早熟”	045
第三节 高度“一体化”的成熟阶段	046
一、《创业史》观念层面的小说样本	046
二、《艳阳天》意识形态表达的通俗化文本	053
三、短篇小说模式的承继、困境与定型	060

第二章	合作化运动的动力之源及其小说叙事	067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及其动因	068
	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阶段	068
	二、农业合作化的目的	072
第二节	互助组、初级社的动力叙事	078
	一、互助组动力叙事的演化	078
	二、初级农业社的发动手段及其文学表达	087
第三节	合作化高潮的动力叙事	100
	一、社会主义高潮的发动	100
	二、还原与遮蔽:《山乡巨变》叙事的两重性	103
	三、从强制到自愿:小说对动力之源的叙事转化	108
	四、农业合作化顽疾及其文学书写	113
第四节	公社化的动力叙事	119
	一、人民公社化的原因	119
	二、粉饰、隐语、批评与失语: 人民公社题材的四种叙事层面	120
第三章	人物关系的阶级形态及其现实基础	135
第一节	“中间人物”叙事的渐变	136
	一、从人民内部矛盾到敌我矛盾	136
	二、从日常性反抗到政治反动	140
	三、从非敌非友到阶级敌人	144
	四、“中间人物”叙事的意义	147
第二节	被道德化的“新人”叙事	150
	一、“旧不如新”背后的政治诉求	150
	二、道德楷模:饲养员形象的演变及其定型	154
第三节	英雄的建构及其意识形态表达	162
	一、不断政治化的人性要求	162

二、英雄人物的演进及其意义·····	165
三、英雄背后的权力寻租·····	170
第四节 阶级敌人的泛化·····	174
一、被强化的阶级层次·····	175
二、地富叙事中的“丑角化”手段·····	177
三、党内异己分子的叙事演化·····	179
第四章 当家庭遭遇革命·····	187
第一节 传统家庭的文学变形·····	188
一、从“和睦”到“不和睦”：小说对现实的改写·····	188
二、受到鼓励的大家庭解体·····	191
三、丧失转变可能的“落后”家庭·····	200
第二节 新型家庭关系及其文学建构·····	202
一、大义灭亲的政治伦理·····	203
二、家庭纠纷的政治化·····	205
三、“去私化”的开放家庭·····	206
四、被削弱的父权·····	209
第五章 身体、性爱与合作化的政治需求·····	211
第一节 身体的“缺席”·····	212
一、铁姑娘叙事·····	212
二、禁欲的英雄爱情·····	218
第二节 身体的“在场”·····	223
一、政治话语中的女性身体·····	223
二、“在场”的男性身体·····	231
三、性作为潜在的趣味·····	233
第三节 溢出主流意识的身体叙事·····	236

结 语	239
参考文献	245
一、主要著作	245
二、重要期刊文章	250
附录一	
真实之辨	261
一、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	262
二、未经教化的真实	267
三、被教化的真实	270
附录二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重要篇目索引	278
附录三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民间采访（一）	288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民间采访（二）	294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民间采访（三）	296
后 记	301

导 言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在整个“十七年”（1949～1966）的农村生活中，对农民现实生活触动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就是1950年代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是继土地改革后出现的又一次具有非凡政治意义的社会变革。从老解放区山西、东北、华北开始，一直到西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乃至西藏，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中国亿万农民都被卷入了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在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推动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四个阶段，逐步将土地私有制转化为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国农民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树木、生产工具等都划归集体所有，在人民公社

化的高潮时期，还出现了“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洗衣组等公共机构。

农业合作化运动无疑是“十七年”时期农村最重大的社会事件，描写这一运动的小说理所应当地占据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核心位置，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仅在运动掀起高潮的1953年9月至1955年底，就出现了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近20部^①，短篇小说数量更是难以计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合作化运动都是作为政治任务、中心任务被作家所关注。围绕农业合作化运动，作家们写出了大量的小说、诗歌、散文、话剧、电影剧本、报告文学甚至快板、评书，来配合这一运动的宣传。各大文学刊物纷纷开辟专栏，集中刊登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一些亲身参加过合作化运动的农民也写出了小说作品，比较有名的有李茂荣的《人望幸福树望春》，这也是1949年后第一部农民创作的长篇小说；潮汕籍农民王杏元，也在专业作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写出了反映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那些擅长写农村题材的著名作家甚至长期落户农村，以便近距离观察合作化运动给乡土中国造成的深刻变革、这场运动中的矛盾冲突和政治斗争，以及巨变在传统农民的家庭生活、心理观念等方面引起的变化。他们创作出不少以合作化为描写重点的长篇巨著，其中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奠定了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在“十七年”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在那些被公认为“十七年”的经典作品中，有相当大的数量都是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除上文提到的4部长篇外，还有大量的中短篇名作，如《不能走那条路》《喜鹊登枝》《运河的桨声》《锻炼锻炼》《李双双小传》《铁木前传》《风雪之夜》等。这些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农业合作化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各个历史阶段，共同完成了对合作化运动的起源、发展直至高潮的全程叙事。不仅如此，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既有对各个阶层农民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的分类书写，又有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家庭结构、妇女地位等社会形态的全面展示，更有对合作化运动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的观念性阐释。因此，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一代中国人认识合作化运动、了解“十七年”时期农村现实的重要依据。

然而，二十余年集体化运动的实践，最终证实了这场大规模的制度试验的乌托邦性质。尽管1955年的

^① 康濯《关于两年来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小说》，《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要保护农民已经得到的土地果实，要在土地改革之后进一步地巩固工农联盟和加强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要根本消灭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除了发展合作化，再没有别的道路。”^①但在现实中，这条路却很快就走到了终点。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被彻底废止。在改革话语中，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新时期农村的巨大经济变革就建立在从制度层面上，中止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政治行为上的。

曾经改变了一代中国农民命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同类题材小说，都面临着被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问题。

值得深思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方面在事实上被终止，被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新型农村政策所替代，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依然被保留着相当正面的姿态。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批评界对于描写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包括热烈宣传和赞美运动的小说，并没有做出与制度变革同步的评价。除了对“文革”前夕创作的《艳阳天》和《风雷》提出有限的批评，认为作品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影响，表现出政治观念写作的痕迹外，对其他重要作品的评价仍以褒奖为主，认为《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小说在表现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农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合作化带头人的正面书写等问题上，仍然具有较高的真实性。

这种状况逐渐引起了一些批评者的不满。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质疑此类小说真实性的声音。一些文章尖锐地指出，不仅是《艳阳天》，而是“十七年”所有农村题材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左”倾思潮的影响，人物形象越来越高大、写作越来越僵化，直至完全不顾农民疾苦。评论者最后把小说虚假性的原因，归结于作家不够完善的道德良知和退化的艺术准则。^②这样的声音曾一度在批评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对“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研究中，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太多的疑问没有找到恰切的答案。比如，“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高大完美的合作化英雄是否完全没有现实基础？某些被批为强化阶级斗争观念的作家，在

① 陈伯达《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1955年10月4日。

② 王锐《生活·思潮·创作——漫谈几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题材的长篇小说》，《当代文学研究论丛》1983年第4期。

1990年代还坚称自己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的说法，难道这种辩解完全没有现实依据？备受指责的概念化写作何以形成？《艳阳天》如果仅仅是宣扬了政治理念，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普通读者的欢迎？即便是始终没有受到批评界质疑的，有关合作化运动进程本身的文学书写，就是完全真实的吗？到底是什么力量左右着批评界对小说的评价？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即便是一部充满虚假信息的小説，真的就毫无价值吗？显然，面对这些问题，几句浮泛潦草的肯定意见或慷慨激昂的批评指责是难以服人的。

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首先要扭转处置小说文本的态度。“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不应只是被看作是反映现实的艺术样本，或一种客观性现实，并在这个层面上接受非此即彼的评价。此类小说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表达性现实，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一组研究“十七年”社会文化形态的案例群。因为一部“虚假”的小说文本所传达的信息，绝不亚于一部真实反映生活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者甚至携带着更复杂、更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果具有这样的研究视点，我们就有可能让始终沉默的小说文本开口说话，让它们无声的表情变得充满意味。

如果将“十七年”合作化题材小说看作表达性现实，那么小说描写的所有内容都会具有特别的文化内涵。对家庭结构变迁的描写、对妇女解放的书写，对于各色农民的区别对待，都不再只是真实与否的问题，而是可以透过其书写模式来探究其中深意的文化样本。许多被指认为虚假的书写模式，就会因有效的阐释，而获得重生的理由和存在的价值。合作化英雄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书写，“铁姑娘”的大量出现，大义灭亲的新人形象和因政治原因纷争不断的家庭等等，都将不再受到轻蔑的对待。它们作为一种叙事模式，不断出现在“十七年”小说之中的深刻意义将得到阐发。

因此，对“十七年”小说的农业合作化叙事进行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把“十七年”小说看作是表达性现实而非客观性现实，转变已有研究的切入点，将“十七年”小说研究推向深化。

其次，这项研究将重现“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在“十七年”中的现实意义，还原这些小说在“十七年”的现实语境中曾经起到的巨大作用，从而建立起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参与社会形态建构的研究视角。在此类小说对新旧文化的确认与批判中，还可以考察关于个体与国家、身体与权力、家庭伦理

与革命伦理的关系等极具现代价值的思想问题。

当然,将那些曾大量出现、却已经消失在研究者视野之外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进行搜集、整理,将那些未进入当代文学史考察范围的小说纳入到对合作化题材小说的整体研究之中,还将为今后的文学史写作提供相应的基础性工作。

最后,本论题的研究有可能寻找到一种在文本内部着眼,又能连接起文本外部诸多因素的研究方法,它既不是单纯的实证研究,也不是技术层面的叙事研究。这种从文本中来到现实中去,再落实到文本的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二、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由于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是以政治运动为描写核心的,所以对它们的研究往往带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当中开展的,其批评立场一般由运动导向所决定。合作化运动初期出现的一批针对互助组题材的文学评论,如《对于〈老张参加互助组〉的意见》^①《作品与政策——从来稿〈雇短工〉说起》^②《读〈回到互助组〉》^③等,其侧重点在于小说的思想主题与当下政策是否相符,以及艺术手法是否能够远离概念化、公式化等问题。由于这些评论深度不足,特别是没有触及核心的政治路线问题,因此未能引起评论界的重视。

直到1954年,才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主要是针对一位年轻作者的处女作——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来开展的讨论。这篇小说首发于1953年11月的《河南日报》。翌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做了全文转载并加编者按,认为它“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小说之一”。接着,李琮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④和康濯《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⑤等评论出现。这些文章均表达了对两条道路斗争这一主题的关注。文艺界领导也对此类在合作化运

① 陶平《对于〈老张参加互助组〉的意见》,《东北文艺》1950年第6期。

② 高原《作品与政策——从来稿〈雇短工〉说起》,《河北文艺》1950年第12期。

③ 漫伟《读〈回到互助组〉》,《东北文艺》1952年第10期。

④ 李琮《〈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艺报》1954年第2期。

⑤ 康濯《评〈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文艺报》1954年第7期。

动到来之前，就反映了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反映了合作化的呼声和方向的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

与此同时，那些对两条道路斗争的意识相对单薄的作家则受到了批评。1955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刊登了两篇评论《三里湾》的文章。其中俞林的《〈三里湾〉读后》认为，小说最显著的缺点是，在表现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时，“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而用不够真实的大团圆的结尾把斗争简单地做了解决”^①。虽然作者没有粉饰生活，揭示了生活中的问题，但对于问题的解决却不尽如人意，如对党内蜕化分子范登高的思想转变的描写不具有说服力。评论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由于作者没有能够对农村复杂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深入的挖掘，没有把当下的政治状况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建立必要的联系。

周扬作为文艺界高层领导，对这一类作品也提出了批评。他对《三里湾》的评价是，“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但是“对矛盾冲突的描写不够尖锐、有力，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壮阔波澜和充分激动读者的心灵”。即便那些“处理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富农、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主题”，在解决冲突和矛盾时，也显得过于容易了，如欧阳山的《前程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他同时指出，那些很有田园情调的农村小说，如康濯的《春种秋收》、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共同缺点是缺乏对农村中重大冲突和斗争的描写”^②，其牧歌式的情调非但没有提高小说的审美效果，反而成为一种忽视生活重大问题、美化现实的表现。

从以上对文学批评的简略描述中可以看出，合作化初期文学批评的主要职责是指导作家按照政治要求去理解现实，以阶级的眼光去观察农村。不仅如此，文艺界领导更进一步要求作家，在进行政治想象和虚构时，要使作品达到合情合理的仿真效果，也就是在意识形态表达的有效性方面做出努力。

到1950年代中后期，批评的重心发生了部分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学批评要求小说的现实功利性更强、作家的政治想象更加纯粹。要求小说在对合作

化运动的书写中，应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就是彻底解决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合

① 俞林《〈三里湾〉读后》，《人民文学》1955年第7期。

②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年第5、6期。